

奉节党史资料

第 三 辑

中共奉节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

奉节党史资料

第三辑

中共奉节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奉节县地下党组织概况

陈世良 段开奎 张兴彤

奉节县位于四川东部，地处大巴山余脉和巫山余脉的山麓，是川鄂水路交通要塞，具有一定的战略位置。党组织在这里开展地下活动是从1934年春开始的，直到1949年12月3日奉节和平解放才宣告结束。在这15年里，奉节县的地下党组织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抗日战争走向高潮时，开始发展和组建了党支部，不久又扩建为县特支。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恶浪时，党组织被破坏中断；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秋，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之后，党的组织才从恢复、发展到重新组建奉大巫工委。奉大巫起义失利后，奉节北岸党的组织随即失散，党员被迫转移，只有云奉南岸工委（先改为吐祥特支，后改为南岸区委）仍在开展活动；临近全国最后解放的1949年，党的组织才又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并在广泛建立基层支部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一个区域性的

特支和两个区委，随即又筹建了县特支。

一、党的初期活动阶段

（1934年——1937年）

土地革命时期的1934年春，上海美专学生、地下党员邓友民（奉节人）、谭林（云阳人），奉上海党组织派遣，来到了奉节县和云阳县。当时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抓住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并在川军和民团中，开展兵运和策反，壮大革命力量；准备迎接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中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在川东会师，配合红军开展武装革命。”由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红四方面军的主攻方向不在于立即占领云、开、万，在佯攻杨柳关之后，就西渡嘉陵江北进了。不久，贺龙部队也停止了北攻，撤回到鄂西和湘西。两路红军已不会来到川东会合了。邓友民为了把党的地下工作开展起来，他们乃在云阳成立了一个党的临时支部，由谭林任支部书记，邓友民等为支部委员并负责奉节的工作。邓在奉活动期间，发展了城区的甘子祥为中共

地下党员。

5月，邓友民由奉节去云阳县城与谭林等碰头后，又成立了中共云阳工作委员会，由谭林任书记，邓友民等三人为委员。8月，谭林、邓友民一同来奉从事地下活动，并与甘子祥等一起研究，如何来争取奉节、巫溪的绿林首领崔二旦和王三春等倒向革命的问题。谭、邓一道行至巫溪的大宁河，才打听到崔、王已出走湖北房县，因计划未能实现，遂返回奉节。谭、邓又一起研究了奉节如何来配合云阳暴动的问题。随后，邓友民便前往奉节县育莲乡活动，并成立了一个暴动小组，掌握了一批枪支，动员了一部分农民于1935年1月19日直接参加了云阳暴动。

云阳暴动失利后，刘湘的清共委员会派出反共特务四处搜捕起义人员，邓友民乃于1935年6月被迫转移至重庆隐蔽。

1935年9月，谭林与邓友民在重庆会晤后，又一起回到奉节，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刘湘的特务闻讯后，又紧紧追踪他们，邓、谭只好离奉返回到上海，但他们却在奉节

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7年秋，邓友民又从延安来信至奉节青莲乡，向好友刘志荣等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鼓励他们投奔抗大，参加革命。次年年初，刘志荣串连了艾长青、邓启民、邓友辛、邓友理、邓传汉、廖仲谋等进步青年，分两路，途经重庆、成都和武汉到达延安。其中除邓传汉、廖仲谋因病返家外，其余的均在延安青年战士训练班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连队，走上了抗日道路。

二、党组织的建立及其被敌破坏的经过

(1939年—1940年)

1939年1月，省万师学生、地下党员王庸（奉节人）和余行健（奉节人），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根据万县中心县委的指示，毅然返回奉节，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王庸等首先和东北的流亡大学生周勇山、戴卓颖（周的妻子）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随后王庸就在奉节发展了吴耕厉、江克钦、张休甫、王楚珩、王明宝为中共地下

党员，余行健发展了卫才珍入党。不久，就在奉节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由江克钦任支部书记，卫才珍、吴耕历为支部委员。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与从中心县委派回奉节为国华中学（党办的学校）招生的党员蔡世溶、王剑端等一起，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宣传活动，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是年6月，万县国华中学被国民党查封，为了分散隐蔽党的力量，在蔡世溶、王剑端的引送下，由中心县委委员李英才带领在万县女子中学和国华中学读书的一批学生党员，来到奉节县甲高乡的道龙湾，在王剑端家举办了一次为期短暂的党训班。参加党训班的有蔡世溶、蒋懿谕、王剑端、熊德瑜、欧阳惠、刘祥纯、刘君臣、王精白、蔡世洪、郑礼仪等人。蔡世溶为训练班临时党支部书记。他们在学习结束后，又进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抗日宣传活动。

同年9月，李英才又来到奉节城区举办了党训班，参加训练班的有江克钦、吴耕历、何天祥、詹竹亭、傅相贤、卫才珍等人。学习结束后，在李英才的主持下，即将原奉节县

党支部扩建为奉节县特支，由卫才珍任特支书记。特支委员是：江克钦（分管宣传）、吴耕历（分管组织）、王剑端（妇女委员）、何天祥（候补委员）。特支建立后，他们经过了几个月的抗日宣传和地下活动，遂在城区发展了一批坚持抗日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地下党。并于1940年初建立了奉节中学党支部，由杨大器任支部书记，党员有段禹九、谭啸月等，他们都是从万县金陵中学和国华中学转入奉中读书的。这个支部曾以“读书会”的形式出现，开展过一些地下工作。

当时的县特支，除直接领导唯一的奉中支部外，还领导着奉节北岸大寨一带和南岸安坪一带的地下党员，以及从外地来到城区内的地下党员沈以文等。其领导形式是进行纵的单线联系。

县特支成立后，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活动有些暴露，引起了敌特的注意，对他们进行跟踪监视。卫才珍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不久，万县中心县委派人来奉，向卫才珍等传达上级指示：党员万一被捕，在不出卖党组织的前提

下，可以承认参加“青年救国会”。以保护党的组织。

1940年3月，从云阳县委转移至奉节红庙子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的王庸，约卫才珍在奉节城郊碰头时，向卫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免去卫才珍的县特支书记职务，由王庸接任。卫乃交出了其他党员的组织关系，王便接手领导奉中党支部及全县的分散的地下党员。

同年4月4日，奉中党支部书记杨大器接到卫才珍的来信，信中说要杨与王庸合伙做生意。此信恰恰落到了奉中军事教官黄治槐（特务）的手里，黄偷看后随即将信封成原样才交付与杨，杨竟没有发觉，故无防范。4月8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罗玉策亲自带领警察在城区逮捕了卫才珍，奉中逮捕了杨大器，接着又到红庙子小学逮捕了王庸和以教书为掩护的余行健。不久，何天祥和吴耕历、詹竹廷也分别被传讯。

敌人实行大逮捕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罗玉策、县长易元明、奉中军事教官黄治槐等三人立即组成了特种刑事法庭，对被捕者分别进行了审讯。杨大器、卫才珍在初审中，就供认

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及其组织情况，并写悔过自新书，旋即具保获释；吴耕历、詹竹廷、何天祥在传讯时，也承认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并写保证书，声明与“青年救国会”脱离关系；余行健因未被敌人抓住他参加共产党的把柄和证据，被关押折腾了一段时间后亦以参加“青年救国会”的名义具保出狱；王庸在敌人的法庭面前坚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在党组织的指示下，王庸虽承认参加过“救国会”，但敌人始终把他当作共产党要犯，仍不能被释放。1941年春，王乃设计逃出了监狱，离开奉节前往重庆找到了党组织，又继续从事着党的地下活动。

从此，奉节县地下党组织的活动遂停止中断。少数地下党员到外地去找到了党组织，又继续开展着党的地下工作；也有的虽然与党的组织断绝了联系，但仍然能够就地坚持斗争；只有个别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变节行为。

三、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45年——1949年)

1944年秋，贵州独山失守，当时的南方局估计国民党有可能投降日寇，决定在上下川东发动游击战争，以抵抗日寇侵略和国民党的顽固派。同年冬，南方局青委随即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下乡的进步青年组成了以卢光特为主的奉、大、巫工作组，分别去巫溪、巫山和奉节北岸开展地下工作。1945年10月，邹予明通过卢光福来到奉节黄村以教书作掩护，进行了地下活动。与此同时，云阳地下党员雷寄萍转移到奉节青莲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并和进步学生陈庆惠等一起发动和领导过学生运动。1946年夏，贺德明又通过周伯皋介绍，来到青莲中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建立了党在北岸的地下活动据点。次年春夏，卢光特除几次向贺德明布置任务外，还去过奉节大寨一带，并与地下党员张林甫、王楚珩接上了关系，向他们布置了任务，准备进行武装游击斗争。

在奉大巫工作组陆续进入奉节北岸开始工作的同时，万县中心县委委员刘孟伉也于1945年来到奉节南岸开展了党的地下活动。刺

曾多次到过安坪、吐祥、柏杨和城区进行活动，并帮助筹建了南岸甲高的龙山中学，以此作为南岸党的地下工作据点，为以后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到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因此，川东临委决定在上下川东广泛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伍，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迎接西南大解放。于是临委又决定临委委员彭咏梧去下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并兼任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和川东民主联军政委。为此，彭乃首先分别派出蒋仁风、王庸先后来到奉节、巫溪、巫山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地下工作，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是年11月，彭咏梧带着他的爱人江竹筠和办《挺进报》的吴子见，由重庆经万县、云阳来到了党在奉节北岸的工作据点青莲乡，一边筹建奉大巫支队，一边清理党的组织。为了加强党对奉大巫支队的领导，在彭咏梧的亲自主

持下即于12月正式组建了奉大巫工委，由蒋仁风任工委书记，卢光特任工委副书记，吴子见为工委委员。并先后发展了陈太候、贺德明、肖克成等二十余人入党，加强了革命力量。当时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工委成立后，又随即正式建立了川东民主联军第二支队（奉大巫支队），由陈太候任司令员，彭咏梧兼任政治委员，蒋仁风任参谋长。

1948年1月7日和8日，党所领导的奉大巫支队在巫溪西宁和云阳南溪分别举行了武装起义，首战告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惊动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乃派重兵围剿奉大巫支队。奉大巫支队遂兵分两路转移，彭咏梧等6人在1月16日突围时，遭到敌人的堵截和袭击，牺牲于奉节与巫溪交界的鞍子山黑沟端的暗洞凸处，其他游击队员四处辗转战斗到3月。自此，白色恐怖笼罩着奉大巫，有的党员转移了，有的党员牺牲了，党组织的活动在奉节北岸基本上停止了。

奉大巫工委失散后，吴子见又带着马彭咏

梧分兵离别时所接受的任务，克服重重困难，秘密去云阳的南岸找到了刘孟伉，接上了关系。1948年2月，杨建成、罗曙南、刘一德来到云奉南岸。接着，刘孟伉、吴子见、杨建成等便在泥溪口张惠中家开会，正式成立了七曜山临时工作委员会，吴子见任工委书记，刘孟伉、杨建成为工委委员。同时正式组建成了川东民主联军第四支队（即七南支队），刘孟伉任司令员，吴子建为政治委员。不久，七曜山临时工委又经下川东地工委批准，改组为云奉南岸工委，刘孟伉任工委书记，杨建成为组织委员，刘一德为宣传委员。接着吴子见调往开县工委工作。后因下川东地下党被敌破坏，杨建成被迫转移，刘孟伉被敌追踪而潜伏，工委已不存在了。

为了使刚开展起来的武装斗争不致停顿，4月，下川东地工委又将开县工委委员陈仕仲调到云奉南岸来接替刘孟伉的工作，领导武装斗争。陈仕仲到达奉节县吐祥后，一边清理党组织和发展党员，一边巩固和扩建七南支队，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5月分别组建了两个地

下党支部。即：脚不干党支部，由彭树诚任支部书记，王惠临任支部副书记；芳草坪党支部，由朱自东任支部书记，梁学敏任支部副书记。6月组建了君田党支部，由彭北洛任支部书记，彭乔松任支部副书记。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在已建立三个支部的基础上，又于8月组建了党的吐祥特支，由陈仕仲任特支书记，朱自东任特支副书记，彭树诚、李君明和吴光荣等为特支委员。

吐祥特支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又于10月组建了麻山党支部，由蓝远善任支部书记，贾光欣任支部副书记。次年1月组建了下坝党支部，由黄问衢任支部书记，张仁厚任支部副书记。这时，整个特支已下辖五个党支部，共计党员七十余名，从而加强了党和七南支队的力量。

在吐祥特支领导下的七南支队指战员，为了扰乱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后方，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他们从1948年冬到1949年春，先后两次袭击了云阳的萆草和湖北的板桥，攻打了奉节的安坪和开县的温泉，打击

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使吐祥比奉节其他地区提前半月解放。

与此同时，党的地下活动在奉节北岸也逐渐开展起来了。1948年6月，余行健到重庆找到了党组织，并恢复了余的组织关系。随后，余便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奉节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1月，川东临委乃首先派出杨建成（随后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来奉节清理和组建党的各级组织，四月传达了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决定停止游击斗争，小股游击队改为小武工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杨建成来奉后与余健行接上了头，遂首先恢复了毛崇仁的组织关系，接着又恢复了吴耕历的组织关系，随即便在奉节北岸组建了党支部，并由杨建成兼任支部书记，吴耕历任支部副书记。当时，杨建成又根据党员的分布情况，乃指派余行健到平泉建立了九盘党支部，由余行健任支部书记；毛崇仁到安坪建立了安坪党支部，由毛崇仁任支部书记；不久，申高也建立了党支

部，由赵靖任支部书记。

同年5月，川东临委又从重庆派出地下党员周朗之、张斌到奉节开展地下工作，接着又动员了当时在重庆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刘方陶、刘应春等返奉参加活动。6月，川东游击纵队及巴北支队的主要负责人赵唯、陈恒之及沈凯转移到奉节桃树，随即又转移至公平、竹园，与陈庆惠、陈瑞芝等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7月，万县中心县委调刘直大到安坪、吐祥工作。10月，川东临委调谈剑啸从华莹山地区来下川东分管万县中心县委的组织工作，并兼奉节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奉节地下党从1949年5月至1949年12月，除原来南岸的五个党支部继续存在外，又在北岸做了大量的发展和组建工作。6月分别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即寂静党支部，由周朗之任支部书记；水田坝党支部由钟应茂任支部书记。七月又建立了八个党支部，即平皋党支部，由刘方陶任支部书记；黄村党支部，由刘应春任支部书记；青莲党支部，由肖道敏任支部书记；桃树坪的第一、第二两个党支部，